

社会主义教育材料

(供农村基层干部学习和民校使用)

第 一 輯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教育材料

第一輯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1- $\frac{3}{4}$ 印张·39,000字

一九六三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130册

统一书号：3088·187

定 价：一角八分

目 录

办社十年.....	平顺县金星人民公社主任 徐西沟生产大队队长	李顺达 (1)
枯柳新荣	绛县南樊人民公社南樊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周明山 (6)
三个遭灾年 景象不一般	离石县吴城人民公社李家湾 生产大队八十二岁的老社员	周福宝 (13)
穷山沟有了“金马驹”	兴县白家沟人民公社 白家沟生产大队饲养员	贾宝儿 (19)
碑前月下忆今昔 (阳高县)	王继祥	于振华 (26)
蒲阁寨的新故事 (忻县)	周俊 李斌 纪于	(31)
疾风知劲草	中共和顺县委中心通讯组 山西日报记者	(38)
水流千里归大海	沁源县法中人民公社 支角生产大队社员	邢长兰 (48)
我算信服了集体经济	闻喜县城关人民公社 东河口生产大队社员	刘俊贵 (53)

办社十年

平顺县金星人民公社主任 李顺达
兼西沟生产大队队长

西沟从办起初级社那年算起，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已经整整十年了。现在扭回头来看一看这十年西沟有些啥变化？

山变了，沟变了，人也变了

山变了，过去是“和尚头”，现在是花果山。

沟变了，过去是干河滩，现在是米粮川。

山和沟的变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十年前，西沟的土地平均亩产粮食二百四十二斤，总产四十三万六千斤；现在，亩产平均四百六十二斤，总产八十万零一千斤。今年在新修的滩地上种的玉米，每亩打了一千斤。谁说山地不能多打粮？

十年前，西沟只有林坡一千一百亩，木材树十七万株，干水果树三百株；现在，有了林坡八千亩，木材树七十万株，干水果树三万一千株。俗话说：“家有千树，不愁一富”。现在西沟光木材树每户就平均有两千株，这就给予子孙万代栽下了富根。我亲手在粉坊门口栽的杨树，十来多年已长成了梁材；一九五三年栽的苹果树和核桃树，今年有的每株结了一百八十至二百斤果。再过五年、十年，这三万多株干、水果树，每株就说结五十斤吧，还产一百五十多万斤干、水果哩，可收入它三几十万元，平均到每户名下，有千把元，再加上林坡木材树的收入，谁说山区发不了财？

十年前，西沟的耕畜总共有一百三十三头，其中只有两头骡子，两匹马；现在总头数增加到二百零一头，其中光骡子二十二头，马二十六匹。羊也由一九五一年的六百六十一只增加到一千零八十三只。十年前是靠买牲口种地，现在每年都要卖几十头牲口、几百只羊。

副业门路也越来越广。不光养猪、养鸡有了很大发展，还养了鸭子、兔子和蜜蜂，开办了粉坊、油坊、砖瓦窑，买了胶轮车和铁轮车，再加上刨药材和编造，就可以说是常年有门路，天天有收入。总的一句话，副业收入一九五一年是七千九百元，现在是二万一千一百六十元。

生产发展了，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五一年的总收入是四万零二十一元，今年是十二万八千元。

集体生产发展，社员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十年前是贷款户多，现在是存款户多，一九五一年还有百分之七十二的户缺口粮，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卖给国家余粮。社员王周则说：

“过去是有米不嫌淡，现在是吃饭讲香甜；办社只十年，家家有余粮。”就是穿的、住的、铺的、盖的，也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

自然面貌和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过去有人怕西沟，现在人人爱西沟；过去一些一心想走“独木桥”的人，现在也成了集体生产中的模范。

依靠集体力量，治理山沟

西沟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一句话，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了集体经济的力量和全西沟人们的干劲。

早先，穷山恶水，给西沟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开荒到顶，水土流失，种上庄稼保不住收成，弄得金木水火土五行

俱缺。一九五二年办起初级社来，党支部就发出了治山治水，改变西沟贫穷面貌的号召。当时还有人不相信。郭长则和桑巨河他们就说，万物土中生，无土怎能行？住在西沟到啥时候也发不了财；他俩抬起腿来下山了。要在旧社会，西沟的农民到啥时候也发不了财，可是咱们在党的领导下闹革命，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反动派几座大山都被推倒了，经过互助组，办起了农业社，连西沟这么几座山就改变不了？要是害怕困难，走到哪里也建不成社会主义。他们走了咱们干。有多大力量就使多大力量，先植树后造林，先筑谷坊后开山……十年时间，闸山沟六道，筑谷坊二百四十五座，修大小蓄水池二十五个、拦洪大坝六条、水库一座，开大小渠道三百五十多条，植树造林七千亩，培植牧坡三千五百亩，平整梯田五百亩，在百分之七十的山地上控制了水土流失。这些工程，总共花费了十四万八千多个工，要不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哪辈子能干成呢？不过，开始办社的时候，要下山的走了，没有走的人，对走集体化道路，有的也三心二意，直到一九五六年转高级社的时候，还有人偷偷的卖牲口哩。可是，当他们看到原来老西沟的五座山，连毛草不长，下雨就发洪水，经过治理以后，山上长起了绿油油的树木，山腰修起了一层层的梯田，干沟里修了一个蓄水池，两条拦洪坝，支毛沟里闸起了二十四座谷坊。一九五六年爆发了一次二十年来最大的山洪，结果土没下山，水没出沟，这时候，他们的心才稳下来。

集体化的力量，不光保持住了西沟山上的水土，也坚定了人们走集体化道路和改变山区自然面貌的决心。一九五八年，社员王长志提了个大胆的建议：在村前河沟里修个大水库。这是西沟祖祖辈辈也没办过的事。可是王长志设计了工

程，在各兄弟公社的支援下，一百天时间，水库修成了。水库拦断河沟，庄前的一片干河滩就变成了七十亩好地，一面种了庄稼，一面成了果园。山变，沟变，为发展多种经营创造了条件。老羊工秦克林说：“从前跑好几个山坡，羊还吃不饱；现在，再增加八群羊，也不缺草吃。”过去西沟的猪和鸡也不多；现在有了水库，有了果木树，养了蜜蜂又养了鸭子。过去是龙王爷欺侮西沟人，现在西沟的人们在龙王爷头上（水库空出来的河沟里）栽上苹果树了。

集体化道路越走越幸福

十年来，我们在集体化道路上越走越有劲。办社的第一年，在小南坡地修了六亩地，就觉着比互助组的力量大多了。一九五六年转成高级社以后，当年就修了七十多亩滩地，又觉着比初级社的力量大了。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出现，一天就修成了三百亩苹果园。再从粮食产量上看：互助组时期产量最高的一九五一年，总产四十三万六千斤，亩产二百四十二斤；初级社时期产量最高的一九五五年，总产六十万零九千四百斤，亩产三百六十六斤；高级社时期产量最高的一九五七年，总产七十万零三千斤，亩产四百二十四斤；公社化以后到今年，总产八十万零一千斤，亩产四百六十二斤。真是步步登高啊！社员李才福说：“集体化道路越走越富裕，越走越幸福。”这话的确不假。秦周刚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办社前，我家三口人，冬天穿不上棉衣，全家都在光席片上睡觉哩。现在家底厚了，穿得也光滑了，全家六口人，每人有件毛衣，炕上铺的是毡子，毡子上头有毯子，毯子上头有褥子。”张灵兴说：“日本鬼子烧了我的西屋，十几年盖不起来。刚办起社来，盖了草房倒觉得可以

了；转成高级社，手里有几个钱了，就嫌草房不好看，又修成了瓦房；人民公社化以后，手里钱多了，又粉刷了墙，打了顶棚，安上暖阁，摆上油漆桌椅和穿衣镜。”现在西沟的人们，都信服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更热爱集体经济了。七十多岁的老汉张羊水对他的儿子说：“人民公社给咱栽下了富根，你要和大家扭成一股劲，把人民公社办成铜墙铁壁，我死了也甘心。”

把人民公社的红旗举得更高

集体化十年，西沟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这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集体经济的威力。今后，我们要坚决按照党的指示，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我们的规划是，在今后十年中，还是向山区进军，继续改变西沟的自然面貌，积极植树造林，充分利用土地，把西沟的耕地再扩大五百三十亩，林坡再增加二千亩。这样，再加上改良耕作制度，粮食产量就能增长百分之六七十。除此以外，大牲口，除了出卖要净增百分之四十三；羊，除出卖和宰杀外要净增百分之八十四；干水果产量也要增加三十多倍，同时还可有大批木材支援国家建设。到那时候，西沟的全年总收入就比现在能增加三倍半。总之，我们要把人民公社这面红旗举得更高，让它永远在太行山上飘扬。

枯 柳 新 荣

绛县南樊人民公社南柳 周 明 山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三辆破车九头牛，种地没粪白茬溜；

亩产皮棉二十斤，打粮不过三老斗。”

这几句顺口溜是我们绛县南樊镇一个老先生给我们南柳编的。不怨人家这么说，那时候南柳种地确实就是这个模样。本来收成低，地主官府又压榨，光景哪里能过好。解放以前，全村一百九十来户人家，扛活的，欠债的，讨吃要饭的，还有卖儿卖女的就占到五分之四以上。那时候，邻村上下的人们，谁不说南柳是个“枯树洞”啊！

解放以后，南柳的面貌大大变了。人们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劳动，但去年亩产粮食就达到二百四十七斤，皮棉七十三斤。至于今年的收成，就更好啦。“水涨船高”，生产发展，群众的生活也就慢慢好起来啦。你走进村问一问，有几家人家没积蓄的；你再到农民家里看一看，有几个老少不是乐哈哈的。所以，邻村上下熟悉南柳今昔情况的人，都这样打比方说：“如今的南柳村，真是枯柳新荣啦！”

可是，南柳由穷变富，是走过一段不平的路程的。远的不说，就从一九五八年谈起吧。

听誰的話，走哪条路？

一九五七年冬天，七泉高级社的几个生产队，提出要

我们南柳分家。为啥分呢？人家说：“你们那个枯树洞呀，永远没个好。靠土地，四沟五岭十三道坡，不下雨旱死，下点雨冲光；靠耕畜，五十头老牛，七倒八跌象劈柴，怎能种好地？”

“分就分，穷要穷得有志气，绝不该老让人家跟上咱吃亏。”村里的干部和大部分群众都有股子钢筋劲。

分了家，南柳单独办起了个高级社。党支部马上发动大家出主意。有的说：“要发家，多安瓜，得利大，好倒茬。”有的说：“想打粮，先喂一群羊。”还有的说：“要发财，做买卖，南柳傍着大路边，跑外开店能赚钱。”老贫农梁振海说：“地是刮金板，种地是正办。坡地干旱，咱治坡保水，草大根深，咱斩草除根。只要早起一千个早晨，搭一千个黄昏，赖地就能种好，穷根就能拔掉！”

几种说法几条路，摆在干部们的眼前。该听谁的话，该走哪条路？那时候，咱年纪轻，又刚上“任”，没经验，办法少，急得一身一身直冒汗。回到家，我爹说：“这孩子别愁嘛。你是穷弟兄们选出来的当家人，有事就该多找找咱穷人商议；你念过几年书，不通的地方也可以搬搬书报，学习外地的经验。”老人说的有道理，白天我去找翻身老农请教，黑夜又翻《毛泽东选集》又看报。过了几天，终于理出了个头绪：听贫农梁振海的话，走平顺西沟的路，坚决治坡治水。

好难走的路啊！

第二年春天，地皮还未解冻，我和社主任王长修请上老参谋梁振海，带着三十多名突击队员，登上坡大草厚、七岔八型、最难治理的老狼凹。支部为啥选中这块烂坡地？因为，治住它就会长南柳人的志气，灭困难的威风；治住它，

就会摸出一条拔穷根的路径，给大家摆出个样子。

我们登上老狼凹，村里多数人高兴，少数人怀疑。高兴的人说：“这一锤算是砸中了，做得对。”怀疑的人说：

“事是好事情，就是成不了功，从前老人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都不是白干啦！”

提起从前，治坡失败的教训可真是不少。

有个叫陈绍文的，一年四季，辛辛苦苦治坡治水，最后没治住，反被水冲死了；还有个姓朱的，治坡治了十几年，结果也落了一场空。那时候，各家各户，各走各路，下治上不治，你治他不治，刚垒好一条埝，又被水冲垮了。

土改后，南柳组织起互助组，组长李守信想仗凭大家的力量治坡治水，可是土地分散，人心不齐，到底没治成。一九五五年，村里成立了两个初级社，泰山社主任梁振海又盘算治坡治水，和大家一合计，有的说：“上地还分红，地权还归私人，将来再分地，不是白费劲？”有的说：“咱社的地区里，还有外社外村的插花地，你治他不治，仍然不中用。”结果还是没治成。就是这样，辈辈有人治，辈辈治不住，年年有人想着治，年年治不成。因为有这些事实，就在人们的思想里，打了这样一块烙印：南柳的坡地永远治不好，南柳的穷根实在难拔掉。

我们领头的和突击队员们，并不是不知道先辈们为治坡治水吃过的苦头。不过，大家觉得，从前是单干、互助、初级社，现在是高级合作化，上地连片，全归集体，全村劳力又能统一调动，只要决心大，组织得好，不愁不成功。突击队进入老狼凹，分成两股，来了个两头夹攻，一、二队从沟底往上治，三、四队从坡顶往下治。就靠自己的双手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在冰冷铜硬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削岭填沟，

刷岸削畔，挑土垒埝……。经过整整一个春天的奋斗，老狼凹有近百亩沟坡地就变成很象样的梯田了。

人勤地不懒，“老天爷”也照顾。那年夏天新梯田和老坡地的庄稼就显出高低来了。那梯田里的玉米棒子又粗又长，棉花疙瘩又多又大；那半坡里未经治理的几十亩地里的庄稼，好象害了黄病，草苗平等。人们说：“别看明山年轻，办事可有点子呀！”

可是，正当大家准备收获的时候，忽然一场暴雨，盖顶泼下。老狼凹治过的一大部分梯田，楞埝冲开千条壑，庄稼倒成乱麻窝。站在沟口向里面望去，简直象摔烂了的两瓣烂西瓜。老狼凹被冲后，有些人急得躁脚，有的人垂头丧气，那几个原来抱怀疑态度的人更理直气壮地说：“看，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管人们如何议论，突击队员们还是信心不倒。我们几个干部和老参谋梁振海更主张再治下去。正在这时候，县委侯书记来到南柳村。他勉励我们说：“不怕失败，就怕灰心。何况你们还有一部分成功。要知道，革命的路子是艰难的啊！只要方向对，就找找教训，坚持下去。”

听了领导的指示，我们立刻觉得胆壮了，腰硬了。天不亮，就跑到老狼凹寻找失败的原因。大家发现一、二队从沟底往上治理的几十亩地损失惨重，三、四队从坡顶往下治理的几十亩地被冲得较轻。这是为啥？老参谋梁振海、“天地知”丁有起和老雇农王岐山等一把子老汉经过几天捉摸，对我说：“明山，你知道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千条小溪汇大海，水的流量越往下越大，可是我们上面没完全治住，就在下边分开治。上边的水存不住，下边的地还不遭水冲。”找到了毛病，大家的心里亮了，愁疙瘩开了。给人们一讲

说，谁都认为理由对。不是治坡错误，是迈得步子不对。收罢秋，重新组织治坡队伍，自动报名的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无 风 起 浪

一九五九年秋天，南樊人民公社党委表扬南柳治坡治得对，还奖了我们一面鲜艳的大红旗。受到奖励，本来应该情绪更高，干劲更大。可是到秋后党支部和大队管委会组织好队伍，又全面展开治坡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有两个队的社员劲头不如以前大了。群众是这样，他们的队长也是这样。支委都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就分工找社员去澄底。我跑到南坡顶，和小伙子元喜啦呱，他告诉我说：“有的人怕鞭打快牛，没个尽头，不想干啦。”我不明白“鞭打快牛”是甚么意思，就说：“小伙子，你给咱来个提住口袋倒西瓜，统统倒出来好不好？”元喜这才说：“咱们大队，听说治好了坡，打的粮多，就要加大包产任务，这还不是鞭打快牛。”

这真是无风起波浪，平地长圪堆，是谁的主意呀？晚上，党支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大家说，有浪就要平，不平不稳定。但是怎样平？有的认为这是小事情，开个大会批评一顿就会解决问题，也有的认为这不是小事，它关系党的分配政策应该定几条制度，安定人心。争论的结果，最后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做了明确规定，因为治坡保水，新扩大了耕地面积，三年不计产量，不计征购；赖地变好地，产量再提高，也不改变包产指标。这项制度一公布，人们象吃了“定心丸”，干劲大了，治坡的进度快了，质量也提高了。到去年秋末，我们南柳的一千八百八十一亩沟坡地，已经全部变成了有边有堰、前高后低、层层迭迭的梯田了。

算盘还打在坡地上

去年冬天，我队全体社员异口同声表示，一九六二年要争取平均亩产小麦二百斤、皮棉九十到一百斤，力争赶上有名的侯马市劳动模范王德合领导的杨谈大队。有了指标，怎么个实现法？不少社员说，“靠山烧柴，傍河打鱼”，咱南柳种的大部分土地是坡地，算盘还得打在坡地上。

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柳的坡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水不下坡，土不出地，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柳的大牲畜，早已不是五十头，而是一百五十头了。地不粪多，这是提高产量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的坡地里有六百多亩坡顶地因为坡高路窄，离村又远，年年只能上一星半点“名誉”粪，要保证全面增产是办不到的。党支部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志建议多土化肥，有的同志建议在坡顶上养一群羊，就地踩粪。上化肥成本太高，养一群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支部会上没讨论出个结果，我和大队长王长有又去问老农。陈鹏英老汉说：“人住在哪里，哪里的地就多打粮食。因为出地近、送粪近、省下跑许多冤枉路。”老汉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觉得应该有一个生产队连家带口迁到坡上住，这样打短就近，就能种好地。说起打短就近来，有的同志又建议在坡上修一条盘坡路，买两辆胶轮车，从半坡往来，送粪捎庄稼，省力又及时。

在坡顶上劈山开路，这是南柳人民想都没敢想过的问题；搬家上坡，更是一件大难事。要知道，走惯的山不嫌陡，住惯的房不嫌旧，热窝难离啊！可是万万没想到，公社化了的南柳人，站得高，看得远，有志气，有力量。支部刚提了个头，社员们就自动报名了。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不

到几个月，一条宽宽展展的盘坡路就全线通车了，不到几个月，梁振海和陈鹏英就带着他们那个生产队搬到坡上新窑里去住了。春天，大队添置了两辆胶轮车，随后，社员们自己又买下六十多辆小平车。这一下，送粪运土拉庄稼，人马一出一大串，坡上坡下赛着干，车水马龙，浩浩荡荡。社员们说：“这才叫多快好省哩！”

步 步 高

从前，南柳村的姑娘总要嫁到外村去，外村的姑娘说啥也不嫁到南柳来。这两年，吉峪的姑娘李玉花和李秀贞……，一个跟着一个嫁到南柳村。有人问她们爱上南柳的哪一点？姑娘们说：看中了你村的“步步高”。是啊！过去绛县的人只说南柳的坡地是步步高。现在呢？又增加了三条：一是南柳的产量步步高，二是南柳农民的收入步步高，三是南柳群众的心劲步步高。今年，我们南柳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二百一十二斤半，八百亩棉花虽然还未收完，可是据有经验的老农和科学工作人员测定，一定能比去年的亩产量多收二十到三十斤。明年，我们南柳的农民，又有个新打算，我们计划玉米、小麦、棉花这三种作物都采用优良品种，再整修一条洪水渠，把涧水引出西沟来。这些计划实现后，一年至少又可增产粮食四万斤，皮棉万余斤。这样我队社员的收入就会更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就会更大。五年前，我们年年要吃国家的供应粮，这几年，变成了年年向国家卖余粮，今年，光小麦就卖给国家六万三千八百斤，明年能卖多少？自然是水涨船高，只多不少。

马 良 张裕民整理

三个遭灾年 景象不一般

离石县吴城人民公社李家湾 张福宝
生产大队八十二岁的老社员

去年冬天，下头一场雪的那天，天气实在冷！可是，咱的心是热的。就在这一天，我们大队开始分配秋收果实，我的孙子润来一口袋一口袋的往家里扛谷米；我那孙媳妇，也在这一天把过冬的棉袄给我准备好了。

我看着后窑底放着几瓷瓮粮食，又看着崭新的棉袄，眼里不由得掉下泪珠来。孙子、孙媳妇见我落了泪，就慌忙地问我：“爷爷，你，你这是怎哩？”

我擦了擦眼泪说：“一九六〇年咱这里遭了大灾，如今灾后一年工夫，就要吃有吃，要穿有穿……。”

“爷爷，这还不好么？”

我说：“爷爷是从旧社会活过来的人，想起了那些遭灾年呀……”

旧社会遭灾：富人发财穷人饿死

光绪二十六年，是离石县有名的大灾年。

头年春天，老天爷六个多月，没有下过一点雨，土地干得象石板，庄稼种不进，连草也长不起来。到了“小暑”节才下了一场雨，掐指一算，晚秋还能赶得上，人们就犁地、就入种。可是没有想到，阴历七月“白露”节那天，天变了，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了一股冷风，就地起了一层霜，把正

在上籽的庄稼齐刷刷的冻死一地

我那年十八岁了，记得清清楚楚：好多庄稼人看着冻死的田禾，气哭了。

霜冻过去了，大风还没有停。冻干了的庄稼穗子让风一摆，籽粒儿在地上落了一层……唉！老百姓多苦呀，背日头、熬月亮，整整受了一年，只落得一把秕谷、一把秸草。

第二年一开春，咱穷人就没个活法啦，山洼背坡处，尽是挖苦菜的，挖着挖着，有的人爬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啦。那时节，先是人杀的吃狗，后来就是狗咬的吃人，真是人吃人、犬吃犬、人犬相吃呀！

可是，财主家存着很多粮食，不往外借，就是春上吃一斗，秋后还二斗，人家也不肯——人家还怕你活不到秋天哩！有家产的卖家产，一个油漆柜子才换四升米；有土地的卖土地，一亩好坡地才卖三、四升米。没有家产没有地的，给财主打短工吧，一天给你五个铜麻钱，连财主的半合米也买不到，还是活不成！穷苦人呀，在那个社会里要活下去，可真是难哩！刘长福的爹饿死了，他娘引着他弟兄三个向地主借粮食，人家不借；后来老大老二都饿死了，他娘流着眼泪，引上他另嫁了人。唉！穷人是家破人亡，可财主家是乘机敲榨！全村原来有一百一十三口人，一个春天，就逃走了三十六口人，饿死了十五口人。财主们可发财啦，全村总共有八百五十三亩土地，一个春天三家财主就买了五百来亩。灾年过后，一架山一架山的土地，全成了财主家的了，唉！真是旧社会遭灾，富人发财穷人亡。

单干时遭灾：一年遭灾三年穷

一九四七年，咱这里实行了土地改革。穷人们分了窑，